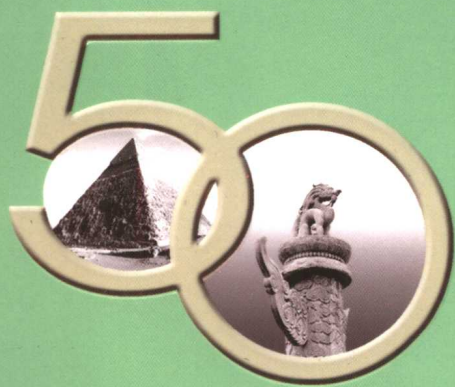


丝路新韵



新中国和阿拉伯国家
50年外交历程

外交笔会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

主编/安惠侯 黄舍骄 陈大维 杨 健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丝路新韵

——新中国和阿拉伯国家 50 年外交历程

组 稿 外交笔会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

主 编 安惠侯 黄舍骄

陈大维 杨 健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丝路新韵：新中国和阿拉伯国家 50 年外交历程/安惠侯等
主编；外交笔会，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
基金会组稿．—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8
ISBN 7-5012-2939-2

I. 丝... II. ①安... ②外... ③解... ④中...
III. 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阿拉伯国家-现代
IV. D829.3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0995 号

书 名 **丝路新韵——新中国和阿拉伯国家 50 年外交历程**

责任编辑 贾如梅

文字编辑 张永椿

责任出版 林 琦

责任校对 马莉娜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排版印刷 北京力托科技有限公司排版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87×1092 毫米 1/16 19 印张

字 数 30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6 年 9 月第一版 200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32.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位于亚、非、欧三大洲结合部的阿拉伯国家，战略位置突出，又是人类古代文明和世界三大宗教的发祥地，从来就是国际社会中的一个重要成员群体。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间的关系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彼此就有了往来，开辟了“丝绸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6年与埃及建交肇始，至1990年完成与沙特阿拉伯建交，先后通过三次高潮，成功地与全部22个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迄今，中阿已走过了50年外交历程。一批中国驻阿拉伯国家的资深大使，以及几位多年从事阿拉伯国家研究的知名学者，经过精心构思，深入查证权威资料，认真撰写了中阿关系重大事件的亲历记。这一篇篇华章、一段段佳话、一个个可资借鉴的案例，均为中阿关系史上弥足珍贵的文献。阅读这些文章，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中阿交往的这50年，充满了中国外交丰富多彩、成效卓著的生动实践，不但特色鲜明，而且经验良多。文章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这层意思：中国和中国人民与阿拉伯国家和人民永远是真诚的朋友。

责任编辑：贾如梅

文字编辑：张永椿

责任出版：林 琦

责任校对：马莉娜

编委会名单

组 稿 外交笔会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

主 编 安惠侯 黄舍骄 陈大维 杨 健

编委会 安惠侯 黄舍骄 陈大维 杨 健
黄桂芳 孙必干 赵学昌

目 录

序 是纪念文集,更是历史文献	朱威烈/1
前言 中阿关系的回顾和展望	杨福昌/5

一、中阿外交关系的建立

中国埃及建交五十年	郁兴志/21
周恩来总理亲手培植中埃、中阿友谊之树	詹世亮/37
战友情谊 历久弥坚	
——中国与阿尔及利亚建立外交关系始末	王新连/44
睿智抉择	
——记中国与突尼斯建交及两项重大合作项目	谢邦定/57
中国科威特建交的坎坷历程	张志祥/71
水到渠成:中国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建交	袁鲁林/79
关于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建交的历史回顾	孙必干/88
患难知真交	
——记中国人民与巴勒斯坦人民的友好关系	时延春/100

二、中阿领导人重要互访

周恩来三次访问埃及	詹世亮/113
杨尚昆主席阿拉伯四国之行	刘宝莱/124
记江泽民主席对埃及的两次访问	安惠侯/137
胡锦涛主席访问阿尔及利亚	王旺生/145
尼罗河连接长江和黄河	
——记穆巴拉克总统对中国的第七次访问	安惠侯/152

布特弗里卡

——中国与阿尔及利亚友谊的缔造者 郑阿全/159

难忘的回忆

——记侯赛因国王两次访华 刘宝莱/172

三、中阿合作硕果累累

中也友谊 历久弥新 时延春/183

中国苏丹石油友谊之花盛开 张维秋/196

中国和毛里塔尼亚的经济关系 李国学/204

中国同海湾阿拉伯国家能源合作全面展开 赵学昌/213

中国—阿拉伯合作论坛

——新时期发展中阿合作关系的重要平台 姚匡乙/218

四、中阿文化交流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阿文化交流与合作 赵国忠/229

阿拉伯语在中国的传播 陈嘉厚/241

阿拉伯世界的汉语教学 林丰民/252

五、中国在阿拉伯世界重大事件中的立场

旷日持久的两伊战争 张维秋/267

第一次海湾危机期间的中国外交 王昌义/275

关于伊拉克战争 孙必干/284

序

是纪念文集，更是历史文献

朱威烈

1

由《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发起并支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和外交笔会组织并完成的这本文集——《丝路新韵》，旨在纪念中国—阿拉伯国家关系最近半个世纪（1956—2006）所跨越的光辉历程。经过一年的努力，文集终于在中阿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结束后不久付梓问世了，真是可喜可贺。这本文集的作者，是一批中国长期驻阿拉伯国家的资深大使，以及几位多年从事阿拉伯国家研究的知名学者。他们大都是我的前辈和老师，不但德高望重，而且经验学识都远非我所能企及。因不敢有违文集主持方之托，遂不揣冒昧，在这里稍谈几句对中阿关系 50 年的粗浅认识。

追溯当代中阿关系的发轫，我想，首先应归功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外交理念——指导思想和原则方面的创新，最突出的是由举世公认的杰出外交家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求同存异”精神。

据现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副会长黄桂芳大使回忆，1953 年 12 月

朱威烈：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阿拉伯世界研究》期刊主编，约旦皇家伊斯兰思想研究院院士，埃及开罗阿拉伯语科学院通讯院士。

31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在接见来北京谈判的印度政府代表团时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后改为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这是中国首次完整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见《新世纪初世界大势纵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接着，1954年4月18—24日周总理在印尼万隆参加亚非会议期间，面对各国对中国政策的疑虑或误解，反复强调了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应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从而扫除了阴霾，受到了与会亚非国家的信任和尊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求同存异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凝聚成为对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观，不但符合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基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各国的稳定、发展，是对国际关系民主化作出的重要贡献，而且直接为中国外交赢得国际社会首先是亚非国家的广泛认同创造了必要条件，为拓宽中国的国际发展空间特别是进入西亚非洲地区奠定了坚实基础。从1956年5月底起，中国与埃及、叙利亚、也门次第建交，到1990年7月最后与阿拉伯世界中的沙特阿拉伯建交的全过程，以及50年来中阿在各个领域的关系取得的长足发展，都有力地证明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精神的强大生命力。

位于亚非欧三大洲结合部的阿拉伯国家，战略位置突出，又是人类古代文明和世界三大宗教的发祥地，从来就是国际社会中的一个重要成员群体。二战结束后，随着美国大规模向亚非扩张势力，中东地区的油气资源的大量被发现和开采，阿拉伯国家再一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成为大国角逐、争夺或竞相争取的对象，其大国关系互动的舞台作用也随之表现得更加明显。

从本书27篇专文的阐述、论证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交往的这50年，充满了中国外交丰富多彩、成效卓著的生动实践，不但特色鲜明，而且经验良多，建树不凡，谱写了人民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段段佳话、一篇篇华章、一个个可资借鉴的案例。这里，仅以我的管见所及，略述一点体会。

首先，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50年，清楚地反映了中国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外交政策。从1956年与埃及建交肇始，至1990年完成与沙特阿拉伯建交，先后通过三次高潮，成功地与全部22个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详见本书杨福昌大使：《中阿关系的回顾与展望》），以及冷战结束后，中国准确把握住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先后与阿拉伯国家构建起面向新世纪

的友好合作关系或战略合作关系，到2004年1月胡锦涛主席宣布建立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以及是年7月温家宝总理会见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财长与海合会秘书长，签订双边经济、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框架协议，开始启动中国与海合会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其间，由个别到整体，由局部到全面，由双边到多边的发展轨迹，都经历了认真细致的分析、客观科学的判断和务实周详的部署过程，从而推动了中阿关系不断地稳健提升，这不但符合双方的利益和需要，而且也跟上并适应了区域化合作和全球化形势的发展步伐。

其次，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外交始终具有明显的总体性。杨福昌大使在他的专文中指出，中埃“两国建交的政治基础是反帝、反殖、支持民族独立的共同立场，建交的过程经历了相互了解，先民间、后官方，文化、经贸开路，最终导致政治上建交”。这说明，中阿交往和合作的这50年，双方在政治领域的相互认同和取得共识乃是基础，但交流合作从一开始就限于政府外交政策层面，而是包括了民间，涉及文化、经贸等其他领域，事实上，这50年期间，中阿双方的互访、交流和合作，已扩展、深入到经济、贸易、能源、劳务、工程承包、投资、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新闻、青年、妇女、旅游和宗教等极其广泛的领域。

阿拉伯国家数量多，国情各异。它们面积有大有小，人口有多有少，国力强弱、贫富相去甚远，有的是地区政治大国或油气输出国，也有的是文明古国或劳务输出国。它们的需求、利益取向和关注点不尽一致，需要我们有放的矢地开展工作的。50年来，中国始终重视发挥和调动国内各有关部委、省市和行业的专长和积极性，做到统筹兼顾，分工协作，形成合力，取得了堪称丰硕的成果。一代又一代中国优秀的外交官是骨干，位居主流，其作用与贡献，向为阿方称道，自不必言，即便派出的医疗队、体育和杂技教练组、修路组、打井队等工作人员，也都为中国外交赢得了声誉，他们为阿拉伯人民真诚服务、无私奉献的精神与事迹，至今在当地流传、受人称颂。此外，2001年12月21日成立的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因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构筑起了政治、经济、文化三条学术对话渠道，使中国的对阿外交更趋完善，双方的合作内涵益发丰富。

第三，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外交话语体系，与某些西方大国截然不同。50年来，中国外交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有自己的视角、原则和方式，

即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出发,依据平等、互相尊重、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同阿拉伯各国的政府、政党、政治组织和民间团体发展交流与合作。这种尊重与平等相待,源于中阿深厚的历史文化,延续至现当代,又得到了更深、更广程度的发扬。中阿自古就有交往,丝绸之路上满载着互通有无、互助共荣的历史故事,进入近现代,双方又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和共同的发展任务。因此,中国尊重阿拉伯民族的传统、信仰和生活方式,尊重阿拉伯人民对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的选择,这既是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必然,也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性质所决定的基本原则。反映在话语体系上,中国对阿交往也就从来不带殖民地宗主国那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颐指气使的语汇和口吻,从来就不曾有过用武力相威胁,强迫对方去接受他们并不认同的价值观,去进行违背他们心愿的强制性改造。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都在讲求利益的当代,中国作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当然也重视利益交换,有自己的利益话语,但这种话语的出发点和宗旨是互利共赢,是相互促进、共同繁荣,而非唯利是图,只谋一己之私、不顾对方的损人利己。事实上,中阿交往50年,双方已经形成了一套共同话语,那就是总要讲历史传统友谊,讲共同的遭遇和任务,讲文化、价值观中的相似点,讲对和平、正义和进步的共同追求。这套话语从宏观上看,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符合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是中阿关系50年的共同财富,值得双方珍惜,继续用来增进人民之间的友谊,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

中阿关系50年,要总结、归纳的内容极为丰富,上述管窥蠡测,只是想表达一个心愿——希望日后能有中国的外交家或学者来编写一本中阿外交史专著,深化中国外交学的学科建设。

这本文集汇聚了许多位高级外交官和教授精心构思、深入查证权威性资料、尔后认真撰写的文稿,是中阿关系史上弥足珍贵的文献,能为之作序,真正是与有荣焉。这里谨向所有的作者表示我的敬意和祝贺,因为他们已为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外交史作出了贡献;也向《解放日报》国际部的负责同志和中国国际问题基金会、外交笔会的负责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没有他们一年多来的筹备、组织和悉心主持,就不可能有本书的顺利问世。

2006年6月于上海

前言

中阿关系的回顾和展望

杨福昌

5

一、中阿关系的历史回顾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间的关系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彼此就有了往来。陆上的“丝绸之路”从中国汉代的都城长安出发，经中亚，到达两河流域的名城泰西封，即今日伊拉克的麦达因，从泰西封再延至叙利亚、埃及。以后开辟的“海上香料之路”，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间联系的又一条通道。这条路从中国的广州、泉州、扬州、杭州、明州（今宁波）出发，经马六甲海峡，至霍尔木兹海峡，然后溯幼发拉底河北上，至巴士拉、巴格达。另由霍尔木兹向西至阿曼的苏哈尔，再至亚丁，沿红海北上至叙利亚、埃及。这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间最早交往的历史。公元610年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加传教，经过他及其继承人的努力，克服了半岛的分裂局面，创建了强大的阿拉伯帝国，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间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穆罕默德在创教时曾说过：“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他既肯定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和

杨福昌：中国中东学会会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理事，前外交部副部长，前驻科威特、埃及大使。

与中国的交往，也鼓励后人继续加强双方的交流。穆圣去世后的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派使者来华，时值唐高宗永徽二年八月（公元651年），这一年即作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之年。奥斯曼于四年后即永徽六年六月（公元655年）再次遣使来华，此后双方往来不断，贸易、文化交流频繁。双方的历史交往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中阿交流是世界上两大文明的交流，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中阿两个古老的民族曾创造出辉煌的文明，中国的造纸、印刷、指南针、火药四大发明是世界无价的瑰宝，随着双方的交流，相继传入阿拉伯国家。在伍麦叶王朝时期，造纸传入王朝的首府大马士革，所产之纸质地精良。印刷术约于公元10世纪传入埃及。指南针帮助阿拉伯人发展了他们的航海业，并于1180年由阿拉伯国家传入欧洲。火药是经印度传入阿拉伯国家的。阿拉伯国家的数学、天文学和医学均较发达，分别于元朝和明朝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在这些领域的成就。

（二）中阿交流带动了双方艺术和手工业的发展

随着伊斯兰教传入中国，阿拉伯的艺术，如建筑、服饰、绘画等影响了中国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和人民，各地所建的清真寺无一不带有阿拉伯建筑风格。在双方交流中有不少人留居在对方国土，他们把本国的艺术和工艺带到异邦。据中国史书记载，一位叫杜环的人在库法看到了绫绢织工、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东环、吕礼。这些技术工人在阿拉伯国家辛勤劳动，传播技术，成了中阿文化交流的真正使者。

（三）中阿交流中充满友好之情而无侵占掠夺之意

在两千多年的交往中双方互通有无，学术共长，是真正的文明对话。即使在双方鼎盛时期，一方从未对对方造成伤害，在对方没有一块殖民地。2005年，中国在纪念明朝航海家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时，专家学者的纪念文章中都突出了郑和和平之旅的特点。1405年郑和奉命下西洋，以恢复和建立同亚非国家的关系、宣扬大明国威、通商贸易为宗旨。他率领的最后一支船队于1433年回国，先后出使航行七次。前三次，船队仅到印度半岛，从第四次开始，远行至西亚非洲，他去过的阿拉伯国家和地区有佐法尔、亚丁、麦加、索马里等地。郑和船队往往多达200多艘船，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对加深中国人民同阿拉伯人民的相互了解、增进双方经济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而从未对所到之地进行掠夺或殖民活动，因此，船队访问过的国家都纷纷来

中国回访示好。郑和结束航行任务半个世纪后，欧洲的一些冒险家开始对非洲和亚洲进行掠夺式的入侵，开辟殖民地，掠夺当地资源。

（四）中阿交流中充分体现了开放、友好的精神

因为中国实行和平政策，所以它派使者去阿拉伯国家均受到欢迎和礼遇。同样，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派来的使者也是礼遇有加。据史料记载，唐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倭马亚王朝派使者来华，唐王朝对他“授左金吾卫将军，赐紫袍金钿带”。类似的对阿拉伯使节的褒奖很多。中国政府对阿拉伯商人也是持友好、信任的态度，如在宋朝，来华阿拉伯商人增多，他们在广州等东南沿海城市有自己的聚居地，称蕃坊，宋朝政府任命阿拉伯商人担任蕃坊的蕃长，管理自己的事务，他们“巾袍履笏如华人”。谈阿拉伯在华人物，有一人值得一提，即赛典赤·瞻思丁。他于1211年生于古波斯的布哈拉，但他确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是穆圣的31代孙。他在成吉思汗年间到中国，在朝廷做官。1274年，他被元世祖忽必烈任命为云南省的平章政事（省长），他治理云南有方，使云南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都得到了发展，后人对他也怀崇敬之情。赛典赤的后裔在云南繁衍众多，郑和即为其后代，在云南许多地方，例如有一个叫纳家营的小镇，都有其后裔，也就是穆圣的后裔。

二、中阿三次建交高潮

新中国成立至今，同22个阿拉伯国家均已建立了外交关系，经过双方的不断努力，双边友好关系不断深入发展。综观中国同各阿拉伯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时间，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万隆会议开启了中阿建交的大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摆脱殖民主义的压迫，争取独立，广大亚非殖民地国家进行了气势磅礴的民族解放运动。新独立国家百废待兴，力求摆脱外界干扰、自立自强。在此背景下，亚非两大洲29个国家的领导人于1955年4月18日在印度尼西亚名城万隆举办了划时代的亚非会议，体现了他们对联合自强的追求，激励着亚非人民在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携手并肩，共同战斗。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并为会议的成

功作出了重要贡献。出席万隆会议的有九个阿拉伯国家：埃及、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利比亚、沙特、苏丹、叙利亚和也门。会议期间，周恩来同这些国家的代表进行了接触，并在会议上对阿拉伯国家面临的问题给予了支持，他发言支持埃及收复苏伊士运河主权的斗争、支持将巴勒斯坦问题列入议程、呼吁解决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难民问题、支持北非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在24日闭幕式上，他重申“中国人民完全同情和支持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人民为自决和独立的斗争，阿拉伯人民在巴勒斯坦所进行的人权斗争”。可以说，万隆会议为中阿双方提供了一个相互了解的机会，中国人民也曾深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伤害，所以支持阿拉伯国家维护主权、争取独立是一种自然的立场。而彼此的相互了解又为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埃及是同新中国建交的第一个阿拉伯国家。两国建交的政治基础是反帝、反殖、支持民族独立的共同立场，建交的过程经历了相互了解，先民间、后官方，文化、经贸开路、最终导致政治上建交。

中埃在正式建交之前已有文化和经济上的往来。1955年5月，埃及宗教事务部长艾哈迈德·巴库里访华，签订了中埃两国文化合作会谈纪要，规定双方互派教师和留学生去对方任教及学习。同年8月埃及工商部长穆罕穆德·阿布·努赛尔访华，双方签订贸易协定及议定书，规定双方互在对方设立享有一定外交特权的商务代表处。文化合作纪要签订后，中国主管部门立即决定派一名教师、七名留学生赴埃。教师定为西北大学的金家桢教授，学生则在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及外贸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前身）选择。当年9月秋季开学后不久，三校就进行了选拔推荐工作。这项工作很快完成，教师和七名学生学习必要的外事知识后，准备赴埃。与此同时，在埃及设立商务代表处的筹备工作也在进行。当教师和学生准备就绪，计划启程时，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们，商代处的负责人也出席了会见。考虑到台湾在埃及设有“大使馆”，总理认为教师和学生单独去埃及安全无保证，出现问题也无法同国内联系，指示要同商代处人员一起赴埃。也提出由于埃及是伊斯兰国家，学生中应该有穆斯林同学。当商代处筹备工作结束后，周恩来总理再次接见了李应吉主任和张越副主任为首的商代处人员及教师和学生，对赴埃及后的工作做了指示，提出了要求。1955年12月24日，商代处人员及师生一行取道巴基斯坦，于1956年1月初抵达

埃及，代表处正式成立，教师和同学们也分别安排了去语言学院教课和在开罗大学的大学城（学生宿舍）补习阿拉伯文，准备入学。同年2月埃及驻华商务代表处在北京成立，代表是米德哈特·埃尔·法尔。埃及派来中国学习的四位学生中有画家黑白和图玛德夫妇。在中埃正式建交前，两国就开始了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

两国在反帝、反殖问题上的一致立场及双方文化、经济交流的顺利开展，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自是顺理成章。1956年5月16日埃及内阁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断绝同台湾的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表示愿意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换使节。埃方将这一决定通过双方商务代表处，通知了中方。17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欢迎埃及这一决定，表示希望中埃两国尽快建交并互派使节。18日，周恩来致函埃及总统纳赛尔，重申上述内容，并表示深信“两国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将更加有利于促进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5月30日，中埃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政府“考虑到两国的相互愿望，已经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互派大使级的外交代表”。中埃建交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干扰，否则，还会提前完成这一进程。埃及1952年革命后的首任总统兼总理纳吉布曾透露，埃及此前已准备承认新中国，因受到美国的警告而搁浅。1956年5月24日，纳赛尔在接见中国商代处代表时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早已确定的事，前些时未宣布承认，原因是本想使西方大国减少对以色列的援助，让这个地区安宁一些。但是这些大国不想同埃及做朋友，而是向以色列继续大量提供军火。在此情况下，目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最好的时机。”

从1956年同埃及建交开始，至1965年，即“文化大革命”前夕，是中阿建交的第一个高潮期，先后共有十个阿拉伯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它们分别是：埃及、叙利亚、也门、伊拉克、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苏丹、索马里、突尼斯、毛里塔尼亚。

（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带动了中阿建交的第二次高潮

中国于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不但对国家的发展造成极大破坏，对中国的外交也造成了不小的伤害。中国驻阿拉伯国家的使节均被召回参加运动，仅留下驻埃及大使一人。中国同中东国家的经济关系也出现下滑，1966年双边贸易额为1.66亿美元，1967、1968年平均仅为800万—900万美元。自1965年一直到1971年，中国没有再同新的阿拉伯国家建交，